

【公开课】

《倾城之恋》：女人第一次发出不浪漫的声音

□许子东

张爱玲的爱情故事基本上都是悲剧,除了《倾城之恋》。傅雷当时写过一篇文章,赞扬《金锁记》,批评《倾城之恋》,觉得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爱情故事。但把张爱玲放回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脉络里看,会发现《倾城之恋》很特别。

《倾城之恋》讲一个上海女人白流苏,二十八岁,离婚了,回到娘家很苦,上海的家很保守。这里有两个重要情节:第一,她母亲不帮她。张爱玲小说里的母亲都不怎么样,这种情况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很少见。第二,她的镜子帮了她。在母亲那里得不到援助后,她就回到房间,对着镜子,走了几步,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做了一番细细的描写,然后“阴阴的,不怀好意地一笑”。

有人给白流苏的妹妹介绍了一个海外华侨范柳原,却被她抢了。接下来,范柳原就邀请她去香港。白流苏一到浅水湾饭店,房已开好,就在隔壁。两人彬彬有礼,一起跳舞。这个小说和一般的爱情小说有点不同。通常的恋爱故事是先君子后小人的,而《倾城之恋》是一个先小人后君子的恋爱故事。《倾城之恋》一开始两个人就都在算计,女人找“长期饭票”,男人找一个新的艳遇。这个小说为什么在今天还这么受欢迎?因为是很罕见的女性的胜利,把一个花花公子改造成“长期饭票”,是世俗中多少女人的美梦。当然小说只讲了一半的故事。小说中有一段流苏的独白,是有文学史意义的:

流苏自己忖量着,原来范柳原是讲究精神恋爱的。她倒也赞成,因为精神恋爱的结果永远是结婚,而肉体之爱往往就停顿在某一阶段,很少结婚的希望,精神恋爱只有一个毛病:在恋爱过程中,女人往往听不懂男人的话。然而那倒也没有多大关系。后来总还是结婚,找房子,置家具,雇佣人——那些事上,女人可比男人在行得多。她这么一想,今天这点小误会,也就不放在心上。

在这之前,有很多恋爱故事,鲁迅的《伤逝》,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茅盾的《创造》,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所有这些爱情故事里,当男人和女人讲爱情,讲文学,讲自由的时候,没有哪一个女人有过这样的声音:“原来他是要精神恋爱”,“精神恋爱的话是听不懂的,不过没有关系……”“将来找家具,找佣人,都是听我的”。在中国现代文学里,这是女人第一次发出这么世俗、这么实际、这么不浪漫的声音。

这就是张爱玲的文学史意义,她打破了“五四”以来的基本的爱情模式:男性给女性讲文化、讲知识、讲道理,唤醒女性,而女性非常纯真善良,被男性的知识风采所感染,陷入了爱情;有的女性超越了男性,有的女性和男性分开,但她们都是玉洁冰清的,都是相信爱情的。可是,到了张爱玲笔下,女性满脑子想的都是“饭票”,是极现实的问题。男性讲爱情,讲《诗经》,讲“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她听不大懂,只要结婚就好。张爱玲小说的文学史意义,在于她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女性的声音。

中国传统爱情故事有一个基本的模式:一男一女相爱,社会反对,男女是联合起来反抗社会的,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家》《春》《秋》。但《倾城之恋》里,基本上是没有谁也没有社会力量在反对,阻碍范柳原和白流苏,只是这一男一女本身在斗争。这个斗争更加复杂,是男人需求和女人利益的根本性冲突。通俗地讲,男人是没有现在就没有将来的,女人是没有将来就没有现在的。这么一个性别斗争,在张爱玲笔下,描写得非常通俗又非常精彩。

简单来讲,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可归纳为三类。

第一类,忧国忧民,要救世,希望文学作为武器能改造中国。鲁迅、巴金、茅盾等“左联”作家,都是这条线索。

第二类,文学是文人自己的园地,不一定能救国家,但先要救自己。这一类的作家有周作人,一部分的鲁迅,还有郁达夫、林语堂、梁实秋、闻一多、徐志摩等。

第三类,目的是娱乐,怎么畅销流行就怎么写,一切以读者需求为第一。这一类就是鸳鸯蝴蝶派。

而张爱玲这样的作家,哪一类都放不进去。她的风格,讲都市感性,找现代主义,重女性感官,追传统文笔。这种文学现象,和鲁迅开创的主流方向很不一样。王德威曾列举过很多受张爱玲影响的作家,像台湾的白先勇、苏伟贞、朱天文、朱天心,香港的李碧华、刘以鬯、黄碧云,这些作家都继承张爱玲这条线索——有忧患意识,但不一定要去救世界;是为自己,又为社会;是严肃的,又有通俗的方式;追求艺术,又有娱乐的效果。这就是黄子平教授的那句话,张爱玲是一个“‘五四’主流文学史无法安放的作家”。

(摘自《许子东现代文学课》)

纸上巨浪

□刘艳君

你还记得上一次寄信是什么时候吗?你现在还有写信的渴望吗?如果有一天,邮局要被撤销,你会难过吗?又会怎么办呢?

《高山上的小邮局》就讲述了一个一群人合力挽救书信的故事。高山上一个叫波韦尼尔的小村庄,村子里唯一的邮递员萨拉收到领导的电子邮件:因为邮局业务衰落,所以决定关闭邮局。这就意味着,她要失业了。八十岁的罗莎是萨拉的邻居,看着萨拉长大的她为此也倍感焦虑。她想,邮局业务多了,也许萨拉就能保住工作。罗莎决定发起一个文字接龙,这个游戏的规则是,每个收到信的人写一封信寄给村里另外一个女人,因为她相信另外一个女人肯定能理解萨拉带着几个孩子背井离乡的艰难,以此来抵抗政府关闭邮局。罗莎投递的第一封信是给她六十年前最好的朋友路易莎。曾经,她们同时爱上了同一个男子,罗莎不得不“背叛”了她们的友谊。六十年间罗莎反反复复写过很多封信,却从未投递出去。在她心里,这封信是她始终欠着的债。而这一次,借着帮助萨拉这个契机,她最终鼓起勇气写了这封信。于是,一场文字接龙开始了。

全书就此由一封封辗转于不同人之间的书信展开,一系列的人物被卷进这个活动:梦想做诗人的女孩阿尔玛,女诗人玛拉·波斯基,游记和地图爱好者亚历克斯,家庭主妇希帕蒂亚,热线电话联系入曼努艾拉,邮差本人萨拉,邮局清洁女工卡罗尔。整个接龙充满曲折:阿尔玛收到的信其实是寄给十五年前就去世的祖母的,状态不佳的女诗人一开始拒绝读这封信,亚历克斯收到信则是因为他的名字在美国人眼里是一个女人的名字,希帕蒂亚是个不会写字的老妇人,曼努艾拉则自顾不暇不想多管闲事……事实上,只要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池,这个活动就会中断。也是这种“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不确定性,使得这一接龙有了一些浪漫意味,就像故事中主人

公之一亚历克斯说的,这是一首“未完成的疯狂的诗”。

会纷纷加入这首诗一般接龙活动的人,大概都不是一般人吧。这些充满繁言碎语的信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大观园群像:阿尔玛内心很确定自己想做什么,却不被父母理解;玛拉·波斯基功成名就,但却经历过一系列人生转折点,最终隐居于小村庄,而此刻她暴躁、酗酒,很久都写不出诗了;亚历克斯崇拜麦哲伦、马可·波罗,喜欢里尔克,他梦想周游世界,却为了照料得了阿尔兹海默症的父亲而留在村庄;希帕蒂亚一生最大的满足就是“丈夫、儿女和烹饪”,但她却是个视烹饪为绘画的艺术家;曼努艾拉曾经逃离家庭,被未婚夫抛弃,现在又在谋划蒙特利尔之行;离了婚的萨拉与远方的网友费尔南多相恋了……

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丰富的宇宙:在充满喜怒哀乐的生活之下,内心都藏匿着自己的秘密与渴望。在收到的来信中,他们阅读另一个灵魂的人生。而在投递出去的信中,他们也倾诉自己的秘密。无人是一座孤岛,“寄信是只需要用心就可以到达任何地方的最佳方式”。在书信中,这些独特鲜活的灵魂抵达彼此。这座处于现代化洪流中的小村庄,以及这个岌岌可危的小邮局,似乎也成了一种象征:这是人们内心最后可以退守的阵地。大家从一开始被裹挟着参与进来,变成了加入一场有意识的保护行动。在阿尔玛和亚历克斯的促成下,他们组成了一个书信主题的读书俱乐部。最终,他们合力完成了这个接龙,演绎出一场在纸上发生的关于友情、爱情、乡愁、梦想的对话。

这不是一个充满新鲜、刺激的现代故事,它更像一条静水深流的大河,缓缓流动,不事喧嚣。没有高声的呼吁和激烈的行动,只是一群普通人通过文字一起完成了一次无声却响亮的抵抗。每个人物都平凡真实,却又雀跃灵动,就像生活在我们身边的邻人。作者的文字准确简洁、内敛有力,就如明净的河水,但我们却能听到河底暗涌着她对正在消逝的书信传统和普通人情感的珍视和热情。她把这种珍视和热爱具体化,将之赋予人物和故事身上,在一个平静的故事中表达了自己的诉求。如果说,这些人物就像葛饰北斋画笔下生动的浪花,那他们的这一行动就是一幅在纸上澎湃的巨浪。

以更宽的视野观察沂蒙精神

□王世谊

山东人民出版社近期出版了《沂蒙精神研究》系列丛书。系列丛书由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徐东升教授等人撰写,秉持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1月25日在临沂视察时明确指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

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沂蒙精神是一种具有区域性的政治文化,在党的精神谱系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脉相承,是党的初心和使命的集中体现。作者写作中以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为指南,把握时代特点,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容。丛书以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内涵与外延的界定为逻辑起点,

以对革命精神历史形态的具体考察为逻辑展开,以在当代条件下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为逻辑归宿,在史论结合中展开理论分析,贯穿清晰的逻辑主线和鲜明的理论主题,实现了理论阐释历史与现实、抽象与具体的辩证统一。

基于红色文化视角的沂蒙精神研究丛书,从传统讲到创新,将沂蒙精神升华到理论的高度加以阐述,从整体上提升了系列丛书的理论水平和境界。沂蒙精神生成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沂蒙山区践行初心和使命的奋斗历程。针对沂蒙精神研究中遇到的热点问题,丛书对沂蒙精神产生的历史背景、发展历程、时代价值及其实践意义进行深入分析,挖掘沂蒙精神生成的深层次理论,构建沂蒙精神生成的理论分析框架,大大拓展了沂蒙精神研究的视野。丛书对于提升沂蒙精神研究的理论深度、深化中国共产党“初心论”研究具有重大理论价值。

丛书提出从更深的层次解析沂蒙精神与党的群众路线的内在关联性,体现出融思想性、理论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综合创新,对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接力出版社
西班牙安赫莱斯·多尼亚特 著
《高山上的小邮局》



上海三联书店
许子东 著
《许子东现代文学课》



山东人民出版社
徐东升 汲广运 主编
《沂蒙精神研究》

